

成都十二桥遗址瓦当材料初步认识

易 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 通过比对南京、洛阳一带的考古资料, 成都十二桥遗址“隋唐文化遗存”中的几件瓦当作品均可判定为南朝时期的遗物, 其对于探索六朝之际成都的历史与文化面貌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关键词: 成都; 十二桥遗址; 隋唐文化遗存; 瓦当; 南朝

中图分类号: K87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4-0046-04

十二桥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部, 北面越过十二桥路, 延伸至成都中医学院内, 南侧临靠文化公园, 西与四川省干休所毗邻, 东面与新一村遗址相接。其范围东西长约 142 米, 南北宽约 133 米, 分布总面积达 15000 平方米以上, 是成都平原最重要的古代遗存之一。2001 年 6 月, 该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 年 12 月, 成都市干道指挥部在修建自来水公司和煤气公司综合大楼地下室时, 发现一处商周时期木结构建筑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遗址区开展了连续四年的考古发掘和资料记录工作, 实际揭露面积 1800 平方米(分作 I 区、II 区), 出土了一批数量庞大的文化遗迹和遗物, 所属时代涵盖商周、战国秦汉、隋唐三个时间段, 其中后者(报告称“隋唐文化遗存”)主要系遗址第 3、4 层堆积及开口于上述层位下的灰坑、水井、砖墙等遗迹, 出土遗物除大量的青瓷器、陶器和窑具外, 还包括了部分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1] 本文所要讨论的即是这里面的几件瓦当材料, 将首先对它们的年代进行考辨, 随后简要分析一些有关问题。不当之处, 祈请方家指正。

“隋唐文化遗存”中列举的瓦当材料一共 6 件, 均出自发掘区中部和西北部几个探方的第 3、4 层堆积内。根据当面表现的主题纹样的不同, 可划分为莲花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两类, 同

时为便于后文说明, 兹将各类分型描述。

一、莲花纹瓦当

I 型 一件。标本 II T64③:31, 泥质灰陶。当轮较宽, 当面饰凸起的十瓣莲花图案, 瓣体略呈椭圆形, 排列规整。莲瓣之间的分隔线几乎不明显, 仅瓣尖之间有作倒三角形的分隔装饰。当心为一莲蓬, 其上饰一周乳钉状莲蓬籽。直径 11.8、轮宽 1.2、厚 1.2 厘米。

II 型 一件。标本 II T61③:4, 泥质灰陶。当轮较宽, 当面饰凸起的九瓣莲花纹, 瓣体形态及瓣体之间的分隔图案基本与 I 型近同。圆钮当心, 内外均未表现莲籽。直径 13.3、轮宽 1.2、厚 1.7 厘米。

III 型 一件。标本 II T77③:21, 泥质灰陶。当轮较 I、II 型略窄, 当面饰凸起的八瓣莲花纹, 边缘一周凸弦纹。瓣体较 I、II 型宽肥, 前端呈折角状, 瓣内饰窄椭圆形脊和枝叶图案, 排列规整。莲瓣之间有一道直线相分隔, 线端, 作倒三角形。圆钮当心, 内外均未表现莲籽, 外绕一周凸弦纹。直径 12.7、轮宽 1.1、厚 1.4 厘米。

IV 型 一件。标本 II T36③:3, 泥质灰陶。当轮较窄, 当面饰凸起的九瓣莲花纹, 边缘一周凸弦纹。瓣体形态和瓣体间的分隔装饰基本同于 III 型, 唯瓣内仅见有窄椭圆形脊, 排列规整。莲蓬当心, 上有六枚乳钉状莲籽, 外绕一周凸弦纹。直径 13、轮宽 0.9、厚 1.1 厘米。

二、兽面纹瓦当

I 型 一件。标本 II T46③:17, 泥质灰陶。当轮较窄, 当面饰一线条构图的兽面纹, 双目作水滴状, 斜立, 外绕一周单线表现眼眶。鼻部亦作水滴状, 鼻梁线较粗, 上延至近当轮处, 额头表现为树枝形态, 兽头的两侧面颊各有一“W”纹样。嘴部张开, 齿舌外露。直径 13.8、轮宽 0.8、厚 1.8 厘米。

II 型 一件。标本 II T72④:6, 残损, 泥质灰陶。当轮较 I 型宽, 当面饰一兽面图案, 眼、鼻鼓凸, 张嘴作元宝状, 齿、舌表现清晰, 嘴下为数组八字形须毛, 兽面两侧饰卷云状鬃毛。残直径 13、轮宽 1.2、厚 1.2 厘米。

与 I 型莲花纹瓦当当面图案相似的出土物见于江苏南京钟山南麓坛类建筑址(钟山一号坛)^[2]及北魏洛阳城宫城阊阖门址^[3]两地, 前者属一处大型石构建筑台基, 发掘者将其年代推定为南朝早期, 并认为可能系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 年)移建的钟山北郊坛;^[4]后者为北魏洛阳城宫城的正门, 是在曹魏旧门的基础上修补改建的。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 年)迁都洛阳, 始诏大臣穆亮等营建洛京, 至太和十九年(495 年)新都落成, 乃尽迁六宫及文武百官。^[5]由此可知, 该门应建成于都洛之初, 并沿用至北朝末, 而瓦当的年代也相应地处于这一期间。II 型莲花纹瓦当的当面图案与 I 型大体接近, 唯当心饰一圆钮, 未表现莲籽, 其年代与 I 型相当, 约 5 世纪后半至 6 世纪初。III 型莲花纹瓦当细部构图较特殊, 与之造型完全一致的作品另出自成都西安路石刻造像窖藏^[6]上层, 九通造像则均处于窖藏下层, 铭文中纪年从齐永明八年(490 年)至梁太清五年(简文帝大宝二年, 551 年), 可知出土物的主要年代当在南朝齐、梁之际。IV 型也见于成都中医学院工地青羊宫窑址遗物^[7]中, 此型可对应的材料数量颇多, 且集中出于南京一带, 如钟山一号坛、富贵山六朝墓地、^[8]毗卢寺、^[9]大行宫、^[10]张府园、^[11]建邺路南七家湾、^[12]秣陵路、^[13]中山南路铜作坊^[14]及明孝陵下马坊^[15]等多个地点, 年代跨度从东晋晚期至南朝。此外, 南京市栖霞区梁中大通五年(533 年)南平王萧伟墓墓阙遗址^[16]所出一件十瓣莲花纹瓦当以及时代在南朝中晚期的富贵山

M1^[17]内对拼花纹砖面模印的莲花图案也同 IV 型相仿, 而类似的瓦当还曾发现于河北临漳东魏、北齐邺南城朱明门遗址(如 T149②:50)。^[18]

I 型兽面纹瓦当的当面构图以阳线条为主, 简练而粗朴的风格与南京、镇江^[19]等地发现的六朝兽面纹瓦当如出一辙。首先, 兽面的鼻梁与额头部组合成直线分叉树枝状的形态: 即见于南京市白下路南八府塘所出的一件同类瓦当^[20]上, 有研究者根据南京大学北园晋墓^[21]内一件金冠饰上的兽面造型将后者的年代定为东晋时期。^[22]其次, 兽面的双目作水滴状, 斜立, 外有单线眼眶, 这种特征也可从南京市大行宫、张府园及新街口一带出土的瓦当上见到, 由于后者多出自南朝地层中, 故一般被认为属该时期的遗物。另外, 十二桥 I 型兽面纹瓦当上未见面部轮廓线, 而据研究表明, 六朝兽面纹瓦当中不带面部轮廓线者的年代也相对较晚。^[23]II 型在构图的方式上与 I 型截然不同, 兽面的眼、鼻、嘴、舌、齿等部位均采用浅浮雕的效果来表现, 立体感较强, 除翻孔鼻、张嘴作元宝状、齿舌外露的形象可与北魏平城明堂、^[24]北魏洛阳城太极殿、^[25]永宁寺、^[26]宫城阊阖门、一号房址^[27]等地点以及吉林集安东台子高句丽时期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28]相对应外, 其整个兽面的风格特征也同南京市大行宫附近工地所出的南朝中晚期瓦当材料^[29]接近。

基于上面的分析, 我们认为十二桥遗址的这几件瓦当材料均属于 5 世纪末至 6 世纪前半叶的作品, 且其中多数具有明显的六朝瓦当的风格特点, 或可初步视作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影响下之产物。实际上除瓦当外, 成都万佛寺旧址、^[30]商业街、^[31]西安路、彭州龙兴寺塔、^[32]四川茂汶^[33]等地出土及四川大学博物馆藏^[34]的数十件佛教造像上也体现了这一迹象,^[35]且不少造像本身题刻的铭文中即带有齐、梁年号。自晋穆帝永和三年(347 年)桓温平成汉并毁夷少城, 成都始进入到建康政权的版图中, 其间虽有范贲、谯纵的割据及前秦的占领, 但大多数时间里仍能为建康所掌控。^[36]特别是文献记载萧梁武帝时期, 中央政府常选派宗室重臣驻成都, 都督益州等地诸州郡, 如天监初为勋臣邓元起, 寻代以西昌侯萧渊藻。九年, 为始兴王贲。十三年, 为鄱阳王恢。普通元年, 为晋安王纲, 未赴任, 立

为太子，即简文帝。大同三年为武陵王纪。^[37] 太清二年（548 年）“侯景之乱”后，萧纪仍一直奉行太清年号，并于梁元帝承圣元年（552 年）四月在成都称帝，建元天正。^[38] 《资治通鉴》还记载武陵王“在蜀十七年，……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39] 史料中提到的六朝建康与成都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出土物所反映的情况找到了背景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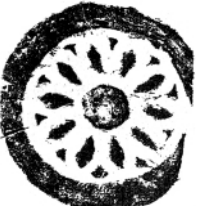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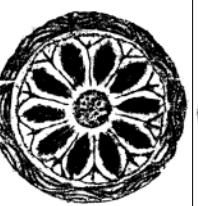


尽管来自建康的风格是成都地区六朝瓦当上主流的文化源头，但一些地域性的色彩却是不容忽视的，如十二桥遗址 II 型、III 型莲花纹瓦当圆钮当心和莲瓣内饰枝叶图案的特征便与南京地区同类型瓦当有明显区别，而成都市商业街出土的植物花草纹作品更于南京等地所罕见；I 型兽面纹瓦当眼眶线闭合、面部两颊处勾勒“W”形纹样也是并不常见的做法。此外，如十二桥 II 型兽面纹瓦当的构图采用了立体感较强的浅浮雕来表现，这种表现手法则并非六朝的传统，其渊源当追溯自平城、洛阳一带的北朝文化。就此看来，成都地区发现的六朝瓦当应是融合了来自建康、平城洛阳及本地三方面的文化因素。值得一提的是，从目前发表的若干兽面纹瓦当资料看，其大多是使用在规格较高的建筑之上的，如洛阳城阊阖门系宫城的正门，太极殿则为宫城正殿，而一

号房址是阊阖门南御道东侧的官署建筑，据其方位推测可能属北魏宗正寺或太庙建筑的一部分；^[40] 集安一带的高句丽兽面纹瓦当集中发现于东台子遗址，其被认为是国内城的帝王宫室或祭祀社稷所在；^[41] 南京出土的兽面纹瓦当中则相当一部分见于大行宫地区，而该区域已经由考古发掘证实系六朝建康宫城（即台城）所在。^[42] 因而，我们不排除十二桥兽面纹瓦当在当时也属较高等级建筑构件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十二桥遗址出土的瓦当是包括了兽面和莲花两种纹样，后一类通常都被认为与佛教信仰关系密切。另一方面，1995 年清理发掘的成都西安路南朝窖藏遗物除九通佛教造像外，还包括大量的绳纹瓦块和莲花纹瓦当，而后的图案形制与十二桥 III 型作品几乎完全一致。由于石刻造像的体积高度多在半米左右，故应该属于供奉在寺庙殿堂内的作品，^[43] 若再联系十二桥与西安路的地理位置相距颇近，则同见于上述两地的瓦当等材料是否可能系附近某座佛教寺院或庙宇的建筑构件？这尚需要今后做进一步的工作来明确。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江章华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特致谢忱！

附表 成都十二桥遗址与其他地点所出同类型瓦当对比图

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瓦当	莲花纹瓦当			兽面纹瓦当		
	I 型	II 型	III 型	IV 型	I 型	II 型
其他地点所出对比材料						
	北魏洛阳城阊阖门遗址出土		成都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窖藏出土	南京梁南平王萧伟墓阙遗址出土	南京新街口一带出土	南京大行宫附近工地出土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十二桥》，文物出版社，2009 年。

[2] 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 《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7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 《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考古》2003 年第 7 期。

[4] 也有学者认为该遗址可能系南朝初年建立的定林上寺戒塔，参见张学锋 《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文物》2006 年第 4 期。

[5]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太和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官及文武尽迁洛阳。”

[6]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 年第 11 期。

[7] 四川省文管会、成都市文管处 《成都青羊宫窑址发掘简报》，《四川古陶瓷研究》（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

[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 《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8 期。

[9] 贺云翱、邵磊 《南京毗卢寺东出土的六朝时代瓷器和瓦当》，《东南文化》2004 年第 6 期。

[10] 王志高、贾维勇 《六朝瓦当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 年第 4 期。

[11] a. 贺云翱 《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初探》，《东南文化》2003 年第 1 期；b. 贺云翱 《六朝瓦当与六朝古城》，文物出版社，2005 年。

[12] 同 [11]。

[13] 同 [11]。

[14] 同 [11]。

[15] 同 [11]。

[16] 南京市文物研究所 《南京梁南平王萧伟墓阙发掘简报》，《文物》2002 年第 7 期。

[17] 同 [8]。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考古工作队 《河北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 年第 1 期。

[19] a. 镇江古城考古所 《江苏镇江市出土的古代瓦当》，《考古》2005 年第 3 期；b. 刘建国、潘美云 《论六朝瓦当》，《考古》2005 年第 3 期。

[20] 同 [11] a. 额头部类似的直线分叉树枝形象在南京市新街口一带出土的孙吴西晋时期人面纹瓦当上即可见到，参见引文。

[21]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 年第 4 期。

[22] 同 [11] a。

[23] 同 [11] a、[10]。

[24] 王银田等 《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遗址 1995 年的发掘》，《考古》2001 年第 3 期。

[25] 钱国祥 《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 年第 10 期。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魏洛阳永宁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 《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 年第 4 期。

[28] 林至德、耿铁华 《集安出土的高句丽瓦当及其年代》，《考古》1985 年第 7 期。

[29] 同 [11] b。

[30] a. 冯汉骥 《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9 期；b. 四川省文管会 《万佛寺继续发现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2 期；c. 刘廷碧、刘志远：《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 年；d. 袁曙光 《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 年第 10 期。

[31] 张肖马、雷玉华 《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 年第 10 期。

[32] 雷玉华等 《四川彭州龙兴寺出土石造像》，《文物》2003 年第 9 期。

[33] a. 袁曙光 《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 年第 2 期；b. 雷玉华等 《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7 年第 6 期。

[34] 霍巍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两尊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 年第 10 期。

[35] a. 雷玉华 《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b. 雷玉华 《四川南朝造像》，《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 年。

[36]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年。

[37] 任乃强、任新建 《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巴蜀书社、成都地图出版社，2002 年。

[38] 李崇智 《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2001 年。

[39] 《资治通鉴》卷一六四《梁纪二〇》。

[40] 同 [27]。

[41]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 年第 1 期。

[42] a. 王志高 《南京大行宫地区六朝建康都城考古》，《2003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 年；b. 贺云翱 《六朝瓦当与六朝古城》，文物出版社，2005 年；c. 张学峰 《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d. 王志高 《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43] 同 [6]。